 亚非拉现代思想文丛
陈光兴 高士明 主编


DEFINE AND RULE
NATIVE AS POLITICAL IDENTITY

Mahmood Mamdani

界而治之

原住民作为政治身份

(乌干达)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 著 田立年 译

 人民出版社




DEFINE AND RULE
NATIVE AS POLITICAL IDENTITY

Mahmud Mamdani

界而治之

原住民作为政治身份

(乌干达)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 著 田立年 译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敏

版式设计:王欢欢

封面设计:石笑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界而治之:原住民作为政治身份 / (乌干达)马哈茂德·马姆达尼著;
田立年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12

(亚非拉现代思想文丛 / 陈光兴, 高士明主编)

书名原文: DEFINE AND RULE: Native as Political Identity

ISBN 978-7-01-016935-4

I. ①界… II. ①马…②田… III. ①殖民统治-研究-乌干达
IV. ①D7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9092号

界而治之:原住民作为政治身份

JIEERZHIZHI YUANZHUMIN ZUOWEI ZHENGZHI SHENFEN

(乌干达)马哈茂德·马姆达尼 著 田立年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6.25

字数:110千字 印数:0,001-3,000册

ISBN 978-7-01-016935-4 定价:28.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总序

陈光兴 高士明

中文世界与亚非拉各地同属曾经的“第三世界”，共同分享着诸多历史经验：现代与革命、反帝与反殖民、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帝国与冷战、后发资本与威权统治、饥荒与难民、分断与离散……六十年前，这些历史经验所带来的迫切压力曾把我们团结在一起。近四十年来，我们与亚非拉各地之间，却逐渐丧失了切身理解与更为积极的互动，无法建立起更为多元的参照，以丰富我们的自我认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随着全球冷战的逐渐式微，我们承继前辈们筚路蓝缕的工作，试图在亚洲邻近地区（南亚、东南亚、东北亚），将分散的思想界重新联结起来，克服殖民、帝国与冷战所造成的多重分化与阻隔，寻求新的团结与连带之可能。通过《亚际文化研究》（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国际刊物近二十年的运作，我们在小范围内慢慢搭建起一个松散的知识网络，以学术讲座、会议、暑期班等形式，推动持续性的思想分享和知识积累。2006年，东亚批判刊物会议正式启动，这是第一个亚洲批判知识分子的思想联动平台。2010年我们更进一步启动“西天中土”计划，推动印度与中国之间的社会思想对话。两年后，我们发起“亚洲现代思想”计划，将亚洲各地一起工作的知识机构连接起来，成立亚洲思想界连带组织“亚际书院”。

2015年，适逢万隆会议六十周年，亚际同仁们共同推动了“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系列论坛，将亚非拉的思想家们聚集在

一起，循着历史的轨迹，梳理过去六十年间世界文化格局的更迭变幻。审视六十年来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看到：在新殖民/冷战/资本全球化等多重历史动力的作用下，在当年的“第三世界”框架中，新的发展模式和历史动力正在形成。放眼当下，“金砖五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发动机；而印度尼西亚，这个当年万隆会议的召开之地，已然位列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第一线。前/殖民地以及前/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已步入了全球化经济浪潮的前端。传统的东/西、南/北、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分野，在新的国际发展形势下正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而中国正以“一带一路”为中心，与欧亚非各国共同探索新的国际合作和协同发展模式。

这一切为我们开启了一次由历史纵深回头眺望的契机，更重要的是，这让我们体会到，当年的“亚非拉”想象在思想连带与知识互动的层面上并未充分展开。被冷战分割的中文世界，其知识生产依然局限在“中

西”二元结构之中，甚或沉溺于内部的割裂感与情绪性感伤中，依然缺乏在世界史层面进行自我理解的多元参照体系。这是我们发起“亚非拉现代思想文丛”的根本缘由。

本丛书希望向中文读者介绍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亚非拉学者们近年来的思想成果。丛书作者中既有中文读者熟悉的新马克思主义南方旗手萨米尔·阿明 (Samir Amin)，也有刚刚进入中文学界视野的印度思想家阿希斯·南地 (Ashis Nandy) 和国际发展经济学的推动者卓莫·夸梅·桑达拉姆 (Jomo Kwame Sundaram)，还包括初次引介的非洲社会研究发展委员会 (CODESRIA) 前主席萨姆·莫约 (Sam Moyo)，以及现代性智识的去殖民批判者、全球百名知识分子中位列第九的马哈茂德·马姆达尼 (Mahmood Mamdani)。这些作者们将与我们分享他们半个世纪以来在各自历史现场中累积起的思想经验，带我们重新认知亚非拉的思想遗产以及它在当代的现实意义，重新探究“第三世界”文化在新世纪语境中的思

想变化；从这些累积和变化中发展出多异的思想模式与知识系统，来直面今日政治状况和生活世界的纠结繁复，并对之做出多层次的解释。

在与这些思想者的交流中，我们感受到他们对中国的善意与期待，他们期待中国的和平崛起能够为世界的多元发展开辟一条另类道路，在冷战之后的世界史脉络中寻找国际团结的新形式，在全球新语境中为“亚非拉”找到重新奠基的土壤。

我们期待着以这套丛书为契机，系统梳理亚非拉各地重要的思想资源，持续探索这些思想资源为中文世界带来的新转机、新想象以及新的思维模式，进一步构建一种与民众生活和现实经验紧密相连的多重异次元世界观，让世界走向更平等、更互重、更和平、更公正的大道。期待中文学界给予本书系持续的关注、鼓励与批评。

2016年8月

中文版前言

本书围绕三个基本观念展开。第一个观念是，标志大英帝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陷入危机的三个重大事件，即 1857 年印度起义，1865 年牙买加莫兰特湾暴动，以及 1881—1898 年苏丹马赫迪运动，引发了一个学习过程。从这一连串的挫折中能学到些什么？作为英国法律人类学家，同时也是后 1857 年总督府法律委员会的成员，亨利·梅因（Henry Maine）在其著作中对此做出了总结。梅因认为，英国在印度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一种“认识上”的错误：自由主义者在殖民地傲慢自大，未能足够尊重“习俗”和“习俗权威”，而揆之于历史，要在印度农村地区维持稳定秩序，这种

尊重至关重要，不可缺少。可惜，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用“文明化使命”来反对习俗，并因而危及了秩序。

第二个观念是，殖民地治理模式随后从“直接统治”转变为“间接统治”。所谓“直接统治”，是大英帝国权力机构为一种野心勃勃的同化主义工程所起的名字，这种工程力图创造一个西化的中产阶级作为殖民统治的中介。在“文明化使命”的旗帜下，这种做法在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间接统治”则承认同化主义工程的失败。这种新的统治形式不再致力于改造传统社会，而是改弦更张，以保护“传统”为己任，方法是支持各级“传统统治者”，让他们成为在殖民当局主持下被作为“习俗法”而加以推行的“习俗”的监护人。

第三个观念是对“习俗性”概念及其在后殖民时期所翼护的权力的批判。所以这是一种理论和政治的双重批判。理论批判由新型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操刀。我以尼日利亚历史学家乌斯曼（Yusufu Bala Usman）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例子。在乌斯曼那里，传统被历史化，从而

也就被“解神圣化”了。而政治批判，即对于殖民主义奉之为“传统”、因此制度性地将其与“现代”隔离开来的权力的批判，则是主张民族主义的政治阶级的成就。在这方面，我愿以坦桑尼亚的尼雷尔“导师”为例。尼雷尔试图创造一种单一的、统一的公民身份，而其途径是：铲除存在于“习俗”权力和“现代”权力之间的行政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区分。

英文版前言

本书灵感来源有二：其一是在2007年阅读了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的《世界与非洲》。^①我认识到，杜波伊斯不是简单地就非洲而论非洲，而是将非洲置于世界历史的语境中。换言之，他立足非洲而放眼世界。其二是埃希特（Andreas Eshete）教授曾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当时他是亚的斯亚贝巴大学（Addis Ababa University）的副校长。他在我关于英国间接统治的一次讲座后提问：这种间

^① 杜波伊斯的《世界与非洲》的“导言”，见 W. E. B. Du Bois, *The World and Africa* [《世界与非洲》]（The Oxford W. E. B. Du Bois Series, Henry Louis Gates, Jr.,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接统治与历史上各帝国的做法有何区别？我的回答漫长并有些缠绕——也许正因为如此，当我结束回答的时候，我明确地感觉到，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认真思考。

本书的焦点是“间接统治国家”（the indirect rule state）。在我看来，间接统治国家是殖民地背景下（a colonial setting）一种典型的现代统治形式。间接统治，与往日西方各帝国实行的诸多统治形式，包括罗马人和英国人在十九世纪中期之前的“直接统治”（direct rule），法国人在二十世纪初转向“关联”（association）统治之前的“同化”（assimilation）统治，有两个重要区别。首先，以往各帝国专注于被征服的精英人士而非被殖民的大众。其次，各帝国致力于通过在文化上以及有时在政治上同化殖民地精英的政策来消除差异，而间接统治则宣称，不仅要承认差异，而且要塑造差异。

差异管理（the management of difference）是现代社会科学中不可触碰的圣牛，一如其为现代治国术之核心。从急于同化（a homog-

enizing impulse) 转向耽于对差异进行界定和管理, 这一转变最明显的体现是从直接统治到间接统治的过渡。我认为, 正是在间接统治的殖民制度下, 差异界定和管理发展起来, 被视为治理 (governance) 之精髓。现代民主国家与其殖民地政权之间的差别在于: 现代国家在承认市民社会 (civil society) 中的差异的同时, 保证政治社会 (political society) 中的平等公民权 (citizenship), 而在其殖民地政权下, 无论政治中的还是社会中的差异都被一同制度化了 (institutionalized)。

在实行间接殖民统治之国家, 通行做法是将公民权限于移住民 (the settler)。我认为, 作为一种政治身份, “原住民” (native) 乃是某些知识分子在帝国遇到危机时创造出来的东西。其中关键人物是反思大英帝国“后 1857 印度危机” (the post-1857 crisis) 的梅因爵士 (Sir Henry Maine)。但是, 除梅因之外, 还有其他一些人同样不能不提, 例如赫格隆 (Christiaan Snouck Hurgronje), 他的反思对象是荷兰帝国在东印度群岛亚齐省的施政举措 (the

Dutch imperial project in Aceh)。与人们通常以为的不同，“原住民”并非指称一种原初和真实的存在状态。相反，正如我们在梅因那里看到的，“原住民”是殖民国家创造出来的：在被殖民的状态下，原住民被定位，被地方化（localized），被文明遗弃和成为被遗弃者，被限制在习俗之内，然后又被界定为这种习俗的产物。

在间接统治下，原住民治理为原住民权力机构（native authority）之特权。作为一种治理形式，原住民行政（native administration）宣称忠于传统和习俗，并将这种传统和习俗界定为单数，仿佛自从遥远的年代起它就已经基本定型了，历久而弥真。无论其各种地方变异形式如何，一套核心规则到处都在起作用。这套核心规则界定了在实行间接统治的各殖民地什么才是“习俗的”（customary）。它作为黄金本位而起作用。这套规则涉及土地和治理。殖民地的全部土地被分割为一块一块的乡土（homelands），每一块乡土代表一个指定原住民部落（a designated native tribe）的家乡

(home)。只有那些被官方命名为原住民的人才可以要求在部落乡土 (the tribal homeland) 上拥有土地之权利。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参与公共事务不再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的权利；相反，这种权利变成了为被认为排外地属于这片乡土的原住民保留的权利。殖民统治下的特权采取两种形式：种族的和部落的。二者皆以得到法律认可的差异为其根据，二者同样也都反过来又被看作是这种差异的证明。移住民世界主义 (settler cosmopolitanism) 被宣称为种族差异的产物，而原住民特殊主义 (native particularism) 则被说成是反映了部落的本真性 (authenticity)。

反殖民民族主义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是被强力推行的差异的解毒剂；它凸显出我们的共同人性。但是，一旦谈到民族主义行动方案 (the nationalist project)，人们就开始莫衷一是了。一些人力图将移住民 (the settler) 和原住民的世界颠倒过来；另外一些人则决心要改变这个世界，以便最后无论移住民还是原住民都停止作为政治身份 (political

identities) 继续存在。一个移住民何时才会变成一个原住民？^① 我在 1998 年开普敦大学就职演讲中提出这一问题并予以回答：一个移住民永远都不会变成一个原住民。对于移住民和原住民唯一可能的解放在于，两者都停止作为政治身份存在。

移住民和原住民共生：如果没有原住民，也就无所谓移住民，反之亦然。要么一起再生产二者，要么一起废除二者。导致它们成为政治身份的是一种在法律上将移住民与原住民区别开来的国家形态，它时而致力于为移住民张目，时而致力于为原住民声索权利。改革这一国家形态，改写支撑殖民政治规划的编史(historiography)，并在这个过程中将“传统”历史化以便重新获得传统，乃是殖民地独立后所面临的政治挑战。

^① Mahmood Mamdani, *When Does a Settler Become a Native? Reflections on the Colonial Roots of Citizenship in Equatorial and South Africa* [《一个移住民何时才会变成一个原住民?》] (Inaugural Lecture, May 13, 1998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New Series No. 208).